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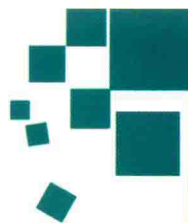
当代经济与管理跨学科新著丛书



代币经济学与当代道德危机治理

TOKENS ECONOMICS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NTEMPORARY MORAL CRISIS

宋 岱 李春艳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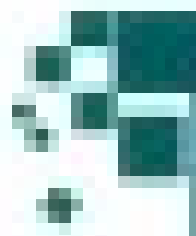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失范经济学与当代道德危机治理

张 杰 李海明 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经济与管理跨学科新著丛书

代币经济学与 当代道德危机治理

TOKENS ECONOMICS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NTEMPORARY MORAL CRISIS

宋 岱 李春艳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21 世纪是非正式制度的世纪,也是人类打破康德“先验”命题的世纪。在这样的时代,代币经济学以另辟蹊径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以理性逻辑为内涵的经济理论演进之路。从内容上看,本书最先讨论的是经济学的东西方学术研究理路矛盾,借助东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理路争议,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格与道德危机理论盲区得以凸显,进而一种全新的以经济学为背景、代币经济为表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展现在学者面前。从实际应用角度,本书走出了新世纪中国经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理论窠臼,形成具有一家之言的学术创新路径,具有理论开拓性和实践延展性。

本书可供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研究人员和公共实务管理人员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代币经济学与当代道德危机治理/宋岱,李春艳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03-4823-0

I. ①代… II. ①宋… ②李… III. ①道德-关系-经济危机-研究
IV. ①F039②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137 号

责任编辑 杨秀华

封面设计 刘长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 10 号 邮编 150006

传 真 0451-86414749

网 址 <http://hitpress.hit.edu.cn>

印 刷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1.875 字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3-4823-0

定 价 30.00 元

(如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老人倒地怎么办？代币经济学告诉你，只要秉持着东方中庸文化的精髓，施救者与受助者双方割断彼此的价值联系就可以安然地相处。

经济危机时该如何自处？代币经济学告诉你，经济危机只是一种道德判断后果，是经济社会自洽的必然结果。它既不会带来经济社会的终结，也不会引发末日危机的后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怎样看待市场给予我们的警告。

中国资本市场与三十年成功的市场化经验是什么，国有经济的地位以及私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如何？这一切都有代币经济做出的合理解读，在这种解读中，市场与非市场因素之间再也不是决然对立的矛盾，按照中庸哲学这两者之间高度和谐的统一恰是东方市场经济得以屹立至今的法宝所在。

理解什么是代币经济学就可以理解什么是今天的中国经济。这是一种源自东方古典文化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也是本土经济学对古典理学思想触角延伸的硕果。

20 世纪是西方经济学的世纪，经济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今天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功不可没，但在 20 世纪末，很多有识的经济学家发现基于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欠缺了人类情感和道德问题的加入。在此基础上，从 21 世纪初开始各种非正式制度流派在经济学领域大范围崛起，以浙江大学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团队更走出了前人从未尝试过的道路。神经伦理团队在哲学上对以康德为代表的纯粹理性展开有实验依据的批判，但是齐齐哈尔大学代币经济学团队却把（从康德实践理性角度出发的）先验问题及情智逻辑融入经济理论视为可能命题，这种尝试形成了今天的代币经济学。事实上，早于神经科学对人类情智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理学研究者就将情智问题加入自己理学的综合研究体系，并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理学研究范式。基于这种范式，东方理学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去情智化的研究方法格格不入，然而 20 世纪末，当学术界对于大数据以及学科综合问题高度重视后，类

似东方理学综合视域的古典研究手段才越来越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代币经济学更是走出了过去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禁区,将经济学与非正式制度命题高度结合在一起,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代币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2007年宋岱加入齐齐哈尔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室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学科研团队开始,代币经济学就与这个科研团队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2014年,李春艳在宋岱教案讲稿及教学案例的基础上,将代币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成果整理成“代币经济学正义”“代币经济学的十二柱维度”以及“找一只猴子来收拾屋子”,并形成本书的相应章节。上述成果虽非其原创,但却表明代币经济学理论研究在齐齐哈尔大学已经进入了深入团队合作阶段。一个以宋岱老师为核心,以代币经济学教研团队为基础的中国式经济学理论研究团队正在我国东北的鹤城形成。相信这将是一个既年轻又具有旺盛生命活力的学术团队,必将在非正式制度问题的研究领域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书共分五章,李春艳撰写第一章和第二章;宋岱撰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宋岱负责对本书进行总纂,一切荣耀归于齐齐哈尔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室全体同仁。

作者

2014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代币经济学正义	1
第一节 经济学中的西方缘起——浅论东方的信念及守护	1
第二节 代币经济学的十二信条	12
第二章 找一只猴子来收拾屋子	62
第一节 找一只猴子来收拾屋子	62
第二节 猴子问题的引申思考	71
第三节 理性与科学	77
第四节 东方理学文化中演进出的理性	87
第三章 论商品	108
第一节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研究	108
第二节 理性的莫比乌斯带	110
第三节 经济危机的道德解读	113
第四节 有关人类理解力的问题	114
第五节 真实市场的案例	117
第六节 经济学的第一源动力之辩	119
第七节 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120
第四章 论道德危机的治理	123
第一节 老人倒地问题的哲学本质	123
第二节 休谟问题的加减法	132
第三节 代币体系的伦理正当性解构	142
第四节 对道德危机的泛经济学治理	151
第五章 论市场的长期演化——以马云的阿里 O2O 为例	158
第一节 金融深化的质量度	159

第二节 东方游资的金融深化之路..... 162

第三节 马云 O2O 的意义及影响 167

第四节 东方游资的前世今生 171

第五节 东方式的市场化谅解 179

参考文献..... 184

第一章 代币经济学正义

一位知名学者说过,中国人有一个见微知著的优点或通病,类似黑格尔哲学之类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一些朋友经常通过一两句话就可以得出一个冗长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有可能与黑格尔本人的意见相去甚远,其实是这些朋友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种自我解读,但是出于不自信,国人却用黑格尔哲学注解来诠释自己的观点,于是围绕黑格尔产生了种种复杂的哲学流派。我曾就这个问题思考过中国人的境界说与西方的理性本体的关系。

现代经济社会存在一个道德危机,这是众所周知的矛盾,但是道德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有众说纷纭的结果了。一系列的思想交锋指出,沿用过去古典时代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其形成的社会规则不见得不合理,但是其成本却是巨大的,难道我们未来的人类只能生活在摄像头保护的社会,又或者当科技可以欺骗肉眼的时代到来,我们就对道德危机本身束手无策了吗?

这个答案是否是悲观的,取决于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理解,而于我,则引入一种简单的代币经济学方法,试图拯救整个经济学世界走出道德危机的泥潭。

第一节 经济学中的西方缘起——浅论东方的信念及守护

一、经济科学中的西方谜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学中的西方是一个困扰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谜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就尝试着针对现代经济学的西方流派提出一种具有针对性的东方经济学观念。这种尝试几经反复,但是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一个合理的成果。

抛开中国人的学术自尊,西方经济学这个名词也许在西方社会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欧美人不会专门使用一个名词来阐释经济学的西方学理渊源,从而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却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传入东方的经济学思想的统称。经济学即为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只有一个唯一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更具体点说,就是以现代新古典综合派结

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潮所共同形成的经济学本体。经济学本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西方的因素。

所以,如果想要找到一种东方经济学的因素,我们只能从自己本身来找,换言之是东方人自己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现了东方式的社会科学思维存在与西方社会科学思维格格不入的某种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存在,才导致当年的东方学者看待西方理性社会科学思潮的时候具有某种强烈的压迫感,并且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西方的学术研究理路对立起来。归根结底,一切西方的问题其实源自于东方,所以要解决东方人学术思想的这个心结,其实也要从东方自己的学术研究理路来思考。

二、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术思潮,事实上类似百度等公共媒体对西学东渐有着明确的定义:

“西学东渐是指明朝末年一直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自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中国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见百度百科西学东渐词条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见互动百科西学东渐词条

“西学东渐”一词,最早见于1915年恽铁樵、徐凤石根据容闳英文回忆录翻译的《西学东渐记》。

——见维基百科西学东渐词条

以上是三个主流的公共信息平台给出的西学东渐的含义,根据这个词条,西学东渐的思潮不早于明中叶时间,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对于东方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影响。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名词叫“东学西渐”,我们可以看看公共信息平台给出的定义:

“东学西渐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东学西

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见维基百科东学西渐词条

东方文化对西方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却存在一种远来深刻近来淡漠,现代东方文明对西方社会影响逐渐淡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抽象归纳为一种李约瑟难题。对东学西渐问题贡献最多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李约瑟在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谜,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根据李约瑟等学者的研究,早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封建社会文明曾经被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所称道,东方的政治制度较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更加先进,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而在同一时期欧洲政治文明几乎仍然处于一片空白。李约瑟著作的第二部分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其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实际上李约瑟先生的思考可以上延至社会学家魏特夫(1931)的一篇论文《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魏特夫如同许多对东方自然社会科学理解不够深刻的学者一样,提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李约瑟却看到了类似魏特夫等学者在东方科学启蒙问题上的肤浅,并如是评价:“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部分,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下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的结论。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作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三、社会科学中的东方谜题

西方人将东方视为神秘的东方,同样道理,东方人依然隔着一层面纱看待西方问题。这个面纱就是社会科学中西方因素的缘起。

在社会科学领域,众所周知,东西方的学术渊源存在着一种隔阂现象,譬如在政治学上就有西方政治学;法学上没有西方法学但是却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别,所谓英美法系泛指以英国和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为代表的法律制度,而大陆法系则是以传统欧洲大陆的法国司法体系为蓝本的司法模式。这么看来,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着广泛的西方因素,于是经济学自然也不甘人后地被抽象为一种西方经济学的学理体系。

什么是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因素?很多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都会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一种谦下的姿态顺从地接受源自西方的社会学方法,而将社会学方法中的西方两字去掉呢?如果想要问这个问题,其答案显然不在西方社会,而在我们东方自己的学术本源。而这一切似乎都应该从上面提到的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割裂说起。早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其实是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就是所谓的东方理学研究视域。

理学这个名词一般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考察中国理学的历史渊源: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为什么把中国的理学思想作为东方社会科学传承的本体?众所周知,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

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所以,五四运动之前,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的话,这种研究视域一定是指理学研究视域。

曾经有人否定清朝时候理学思想仍然有传承和发展,我们仅举清人吕留良的言论为例:“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吕留良的这个说法将皇帝比喻为地主,他认为皇帝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长远,“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由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清朝理学家吕留良的思想已经与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的辩证历史观非常接近。不过严格意义上说,吕留良所阐释的清代理学恰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直接延续,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的,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谩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晚清的复兴,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另外也体现在理学宗奉者数量的增加。

道光朝以后,伴随着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曾讲学过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涂宗瀛、当涂的夏忻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东方社会而言,存在着一种自传统东方社会一以贯之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东方的理学传统。所以自五四运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思潮之后,东方人将西方两字冠在西方社会科学思潮之前的做法恰恰说明了东方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理学思想的一种笃定的信仰与回归愿望。

四、东方理学的另类研究工具

孔子在《系词》中这样评价周易：“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东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异于西方之处，就在于东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也即理学的研究工具。事实上，熟悉东方理学思想的朋友都知道，所谓宋明理学，其主要研究工具就是《易》。为什么东方理学家会把《易》作为东方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工具的选定其实与东方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其二，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其三，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本体论、认识论同样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哲学家康德就曾经通过三大批判两个形而上学对上面两个问题加以阐释。然而心性论却是只有东方哲学家才喜欢的独特研究视角。把心性问题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剔除的做法，似乎也源自康德。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去情感化的社会学研究思潮，一些学者认为，人的情绪与情感变化会影响正常人的理性判断，只有剔除情绪化影响的理性才能真正体现现代人对于逻辑问题的理性与科学判断。是故在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使用物自体和纯粹理性思考问题，而在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领域，则是自由意志作用于社会规则的结果。无论是纯粹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与人类的情感或情绪因素无关，因此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去情绪化是人类理

性社会研究的关键。以上表明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主体上,东方社会的理学研究视域与西方社会的理性研究视域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分歧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的情智因素是否可以被加诸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著名东方理学学者刘师培在《理学字义通释》的序中曾经写道:“不揣愚昧,作《理学字义通释》;《宋史》撰《道学传》,然宋人之学,兼伦理、心理二科,若《道学》两字,只能包伦理,不能该心理也。”其中“宋人之学,兼伦理、心理二科”一说被后来者广泛地理解为“宋明理学就是心理学加伦理学”。事实上,刘师培对于宋明理学的完整说法应该被理解为“宋明理学是包括心理学加伦理学的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宋明理学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至少包括心理学加伦理学在内。我想这个说法对于很多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倍感惊奇,社会科学每个学科内部的研究已经非常烦琐,而研究方法千差万别,又有怎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可以兼顾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多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共性特征,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研究意见。但事实上,宋明理学不仅仅是心理学加伦理学,古典的政治学、法学、理工农医等诸多科学领域均有理学思想的介入,如果从今人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视域来看,古代中国人的这种学术思维显然是无法被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理解了东方理学的本体观念时,这个概念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费解。正如我们前面说过,东方理学的主要研究工具就是《易》。

五、社会科学中的分分合合

讨论东方社会学观念中易学的“合”却要从西方社会科学观念中的“分”开始说起。什么是西方社会科学去情绪化的研究视域,什么是西方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体系的缘起?如果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一些朋友会把这个时间不自觉地与《国富论》的写作时间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更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分野角度出发,我们却可以将这个时间再向上推至古希腊时期。众所周知,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发端时期,而在很多文献中,这个时期都与一个叫作苏格拉底的思辨哲学学派具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苏格拉底学派的三贤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包括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以及伦理学和辩证法观念的起始都可以连线到苏格拉底学派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存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西学东渐在东方的重要启蒙时点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于诸多西方社会思潮的引入,对于东方人打开窗户看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之后,引入东方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均被加注以西方两字,而此时东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依然是理学研究方法。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推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学方法存在与东方理学研究视域对立的学术研究视角。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对立不是局限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学科,而是几乎全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推论:东方理学的研究方法 with 西方理性社会科学研究视域之间的分歧并非建立在西方理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上,而是源自西方理性社会科学思潮的起点。

第一个推论表明东西方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学术研究视域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所谓坚船利炮带来的技术性矛盾,而是纯粹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范式矛盾。理解第二个推论的关键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缘起,因为如果一种理论范式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存在矛盾,那么这种矛盾显然不是路径上的,而是存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划分的起始点的矛盾。事实上,东方人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观点的提出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敌视态度,恰恰相反,东方人以一种包容的视角接纳了一切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观念,只不过出于自身范式上的差异,东方人却把这些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部加盖了西方两字,用以区分本土的研究方法与外来研究方法。

从第二个推论出发,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 1776 年的缘起对我们的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但事实上,如果放弃经济学亚当·斯密起始论,则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都分别对经济学领域中的分工问题、价值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论断,这三部分问题的归并恰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绝大部分研究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历史可以并且完全能够上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也就是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分野处于同一时代。

为什么将西方社会科学划分的起始时点均递延至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学派?因为正是这个学派的思辨哲学传统使得现代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产生了学术分野。而这种学术分野也是造成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划界的路径起始或源头。于是结合前面两个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命题:“东方人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西方’划分源自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学派,而苏格拉底学派的思辨哲学方法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因素的缘起。”而对于东方社会科学的理学而言,因为不存在与西方同源的社会科学起始阶段的划界,所以理学研究方法就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的结果就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东方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对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注西方两字。如果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么现代社会科学中一切带有思辨哲学或辩证法因素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都可以被归

结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所以问题回归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目前没有一个东方社会科学或东方经济学的产生?因为所谓的东方因素一定与我们自己的理学研究传统息息相关。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与辩证法和思辨哲学画等号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都被人为地标注了西方符号,从而在我们的研究视域下,是我们自己将自己的古典研究工具用一种潜在的东方视域保护了起来。倘若问题的分析仅止于此,有人便会问:“我们依然不能判定理学研究视域的合理性,因为我们尚没有对东方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工具‘易学’加以解读。”那么,什么是易学?

易学是一种整体观,是把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用一种统一的易学方法加以高度概括的社会学假说,是以一个规律研究所有的学术企图。

六、东方理学的缘起与源流

1967年曼德尔布罗特在美国权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海岸线作为曲线,其特征是极不规则、极不光滑的,呈现极其蜿蜒复杂的变化。我们不能从形状和结构上区分这部分海岸与那部分海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几乎同样程度的不规则性和复杂性,说明海岸线在形貌上是自相似的,也就是局部形态和整体态的相似。在没有建筑物或其他东西作为参照物时,在空中拍摄的100千米长的海岸线与放大的10千米长海岸线的两张照片,看上去会十分相似。事实上,具有自相似性的形态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如:连绵的山川、飘浮的云朵、岩石的断裂口、布朗粒子运动的轨迹、树冠、花菜、大脑皮层……曼德尔布罗特把这些部分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称为分形(Fractal)。1975年,他创立了分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研究分形性质及其应用的科学,称为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

抛去易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东方的易学观念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整体视域的社会学观念,这种整体视域的观念认为:社会总是处于不停变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易)变化本身。所以这种视域使得使用东方易学观念的理学家可以使用易学观念对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观念加以高度概括和解读。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东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心性论是否应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得到体现”。类似西方的社会科学问题,研究专家就强调去情绪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路,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体系将西方社会科学分野后,越来越细化的学术路径也逐渐将附着在每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上的情绪化因素逐一剔除。反之,东方理学研究视域下,存在一种以易学为核心工具的研究视域,因此东方人并不强调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剔除情绪化